

# 读书当如傅青主

郝岳才

傅山先生是17世纪中国启蒙思想的前驱者，在哲学、史学、文学、书法、绘画及医学诸方面，都有深刻的见地与重要建树。先生的成就，高尚的人格与天资之外，直接源于终身读书与经世致用的社会实践。也难怪清人如此评价傅山先生：“博极群书，时称学海。”读书是傅山先生的一种习惯、一种癖好、一种消遣娱乐，是他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。从少年时代，一直到生命尽头，他无日不在读书，即便身在旅途，囚拘牢狱，也从未间断。清顺治十一年（1654）6月至次年7月，受宋谦案牵连被捕入狱，他依然潜心于经子与佛道研读，作《太原三先生传》《开我慧者》，传太原文人正气，传读书作学问之法。清康熙二年（1663）4月，在经清化至辉县拜访孙奇峰于百泉间，他一路辛劳却手不释卷，以小草、行书乃至大字行、草手录子书并加以批注，被清咸丰年间文人摹刻为传世《百泉帖》。傅山先生的读书与治学观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体会：

其一，读书需博闻强记，而且要在记忆力旺盛的弱冠年华多读多背多记，不断积累、积淀。他曾为子侄讲述自己青年时代强化记忆的故事。弱冠时，尝与家中西席马生较劲记性，以53篇文章比试。结果年长的马生一天下来仅背得四五篇，自己一早即35篇上口，而且不爽一字。傅山以此告诫子侄，并非自己天资高于西席马生，“此时正是精神健旺之会，当不得专心致志三四年”，“然如此能记时，亦不过六七年耳。出三十则减五六，四十则减去八九，随看随忘，如隔世事矣”。这是傅山先生读书与治学实践的体会，一个人最佳的记忆年龄也不过五六年，一旦误过，追悔莫及。记忆是读书的基本功，也是治学的前提，必须牢牢把握弱冠之年的黄金年龄，记忆、储存前人优秀成果。

其二，读书包括著书，要反复精读，“非颠倒数十百过不可”，需勤学、勤问、勤查书，不要苟且了事。更不要“读死书”“死读书”，读书要明辨是非，取是去非，吸收有益有用的东西。他说：“不拘甚事，只不要奴。奴了，随他巧妙雕钻，为狗为鼠已耳。”“读书尤着不得一依傍之义”。所谓“不依傍”，就是要独立思考，自出新意，自成一派。世间事物在不断变化，所谓“新”“旧”，都是相对的，不是一成不变的。既名为读书人，就应该认识到客观事物的变化。“昨日新，前日陈；昨日陈，今日新；此时新，转眼陈。”“读书如观化，今昨无所住。”客观事物既然在不断变化，一个人的知识学问，也就应该与日俱进，随时俱变。在他批注的子书中，就表现出这种精神。

其三，读书与治学要专精与博综相结合。所谓专精，包含有两层含义，一是“专精下苦”，一是俗话说的“一通百通”。傅山先生在解释“专精”时说：“读书不可贪多，只于一种里钻研穷究。打得破时，便处处皆融。”他在《家训》中教子孙如此熟读《左传》：“作一安身立命之所，作人、养性、学问，都向此中求之。”傅山虽然提倡专精，但并不满足于专研一书，而是通过一书打好学习基础，为进一步“博综”创造条件。他说自己“至三十四、五，始务博综”。其同学戴廷斌说他“二十以后，便读十三经、诸子”，以及宋以前的史书和佛经、道藏。他自己也说，“吾当二十上下时，读《文选》京、都诸赋”。可见从二十岁开始，他已博览群书，为后来在学术上取得成就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他在《训子侄》中说：“除经书外，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战国策》《国语》《左传》《离骚》《庄子》《管子》，皆须细读。其余任其性之所喜者，略之而已。”把经、史、子、集的几部主要书籍，都加以细读，就是为了达到博而精的目的。

傅山先生的读书方法，大体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：

一是批注。读书时，把自己认为的重点和见解，用墨笔或朱笔，批在书眉、书缝之间，对于十三经、十七史，他都下过这样的功夫。

二是札记。边读书边作笔记，有的札记，还经过再一次的提炼和修饰，他的《荀子》《淮南子》手稿就是这样形成的。

三是索引。编写索引，现在已经成为专门的学科，但在300多年前，傅山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开创性工作，先后编写完成《春秋人物韵》《地名韵》《两汉书姓名韵》。

四是删订。比如欧阳修的《五代史》，他认为有优点也有缺点，需“删削冗繁，而与其称谓不当者尽深涂易之以正名”。

傅山先生生前，除戴廷斌刊刻的《晋四人诗》中收录其少量诗、赋外，再无诗文著述刊刻，直到清乾隆十二年（1747）才由张耀先广泛搜罗刻成《霜红龛集》行世，并被后世不断将散落民间的诗文补入。究其原因，不仅仅是他自述的“著述无时无亦无地”，更在于他严谨的治学态度与精神。尽管他并不认为自己批注的《荀子》《淮南子》

读书札记为定本，但鉴于他学识渊博、眼光犀利以及读书方法的缜密，纵然自己不认为是精品，却已不愧为列入著作之林了。可以这样说，傅山先生读书也正是在著书，至少是在储备著书的材料。傅山先生的学术思想更多体现在对于经史与诸子典籍的批注、札记、索引中，这也是他学术思想最重要的载体与表现形式。



## 享受阅读 重温经典

聚焦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

### 刘大鹏的读书生活

李海清

晋阳名士刘大鹏先生，爱书、读书、教书、著书，一生都离不开书。他的作品有千余万字，虽然大部分散失，但就现在正式出版的《晋祠志》《晋水志》（第一册）就达百余万言；去年影印出版的《退想斋日记》（以下简称《日记》），600余万字，只是他所有著作中很少的一部分。如此皇皇巨著，需要深厚的知识积累，没有大量的阅读是办不到的。刘家在当时也只是个普通农家，甚至可以说贫穷，这么多书绝对不可能全部买回来，他是通过什么渠道阅读的呢？我们从他的遗著，特别是《日记》中的蛛丝马迹可略窥一斑。

刘大鹏先生的父亲刘明老先生，思想开明，很重视教育，极力督促儿孙们读书学习、扩张眼界。他曾说：“富贵由天定，非读书所能贫也，况吾家本贫，读固贫，不读亦未必不贫，吾子吾孙安可以不读书乎？”所以刘家尽管不富，但也竭尽全力供子孙读书。

刘大鹏先生9岁时，就本村宿儒刘丽中先生的私塾开蒙读书。后入太原县桐封书院、省城崇修书院进修，前后30余年，系统地读了诸子百家。除此外，他还喜欢看兵书战策、自然科学、时事政治等方面的书籍和报刊，学得很杂。如清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）正月初六的《日记》中，就有他阅读《几何算学原本》的记录，正所谓人们常说的“闲书不闲，开卷有益”。他一辈子与书结缘，直到晚年仍“四书五经留于心中，不至全失”。甚至在他去世前数月，已经被病痛折磨得偃卧在床，仍然默默背诵儒家经典中的章节。

刘大鹏先生阅读了海量的书，来源于何处呢？他的父亲刘明，曾在太谷县李满庄经营过木材生意，家境稍宽裕时，他自己买一点书，但量很少。《日记》中第一次买书记录是在清光绪十九年（1893）七月初四，他去晋祠赶庙会，在一个杂货摊上见有一部《三国志》出售，他爱不释手，倾其所有，花了“三百廿钱”买到手，“如获至宝”。

《日记》中还记述：清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）他赴北京参加会试，游览京城最大的书市琉璃厂，但见“经史子集，如山如阜，如入兰台之室，（令人）目眩神迷。有平生未见之书，浏览翻阅，爱不释手者甚多。恨己贫穷，莫能多购”。遗憾之情溢于言表。

平时也常有好友赠送礼物，若是其他东西，刘大鹏先生能拒绝的都要拒绝，但如果是笔墨纸砚等案头用品，特别是书籍，则来者不拒。有时他也托外出的朋友代买，但主要是借阅、抄录。他文化界、教育界的朋友多，诗书交流是常有的事。

刘大鹏先生有多年的教学经历，特别是在他中举人后，从清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）开始，到太谷县南席村票

号商人武家当私塾先生，前后13年。授课之余，有大量的时间可用于阅读和写作。南席村晋商多，有钱人多，读书人也多，那些人家藏书丰富，借阅十分方便。而且还能看到官方公开的公文、朝廷大臣们的奏疏。《日记》中就有很多他阅读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刚毅、倭仁等当时朝廷重臣奏疏的记录。这不仅使他开阔了眼界，也让他更关注时事政治。

当私塾先生后，他有了稳定的收入，有能力买书了。他到南席村坐馆第一年九月初八的《日记》载：“弟子武人瑞自京来归，为余捎买一箱书籍。有《御纂七经》共16套；《御批通鉴辑览》两大套，共24本；《皇朝经世文编》4套，共24本，贺耦耕辑；《皇朝经世文续编》两套，共24本，葛子源辑；《康熙字典》1部，洋版。”这次购书，应该就是他出手最大方的一次。

随着刘大鹏对考取科举功名的日益淡薄，他更专注于自己撰述，阅读的目的大多出于写书的需要。榆次车辋村常家，经商、教育并重，是清代著名的“儒商世家”，出过多位进士、举人，秀才就有100多名，创办了山西最早的私立新式学堂，涌现出了常遇春、常赞春等数十位著作颇丰的学者、教育家，常家设有“石芸轩书院”，藏书颇丰。车辋村距刘大鹏执教的太谷县南席村不远，他在编撰《刘氏家谱》时，就曾去常家参阅有关谱牒、姓氏源流方面的书籍。

刘大鹏于清宣统元年（1909）辞去私塾先生一职，回到家乡赤桥村。进入上世纪20年代以后，他曾被推为山西省咨议局议员、太原县议会议长、保存古迹古物委员会特别委员。出任过县教育会副会长、县立女子小学校长以及太原县商会特别董、县清查财政公所经理和公款局经理等职。还和友人合作经营过煤窑，主持修葺晋祠古建筑工程……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忙于社会活动、公益事业，以及家庭事务，即使如此，他也没有停下手中的笔和阅读。在家境尚可时，曾一度订阅天津《益世报》、山西《山西政报》《并州日报》。当时，晋祠设有“民众教育馆”，他常把馆里的书、报借回家阅读、抄录，也买过《太平御览》等少量喜欢的书籍。

上世纪30年代以后，刘家日益贫困，连订报的钱也拿不出来，更不要说买书了，但他爱书成癖，仍能想办法通过各种渠道得到读物。如山西辛亥革命元老、十二混成旅旅长黄国梁将军，曾大力支持刘大鹏修葺晋祠，两人结为好友。黄旅长是位儒将，酷爱读书，也有很多书报，他在晋祠建有别墅，经常派人把书籍、报纸借给刘大鹏阅读，有的读物就干脆奉送了。

乡贤刘大鹏先生博览群书，学以致用，为我们树立了榜样。